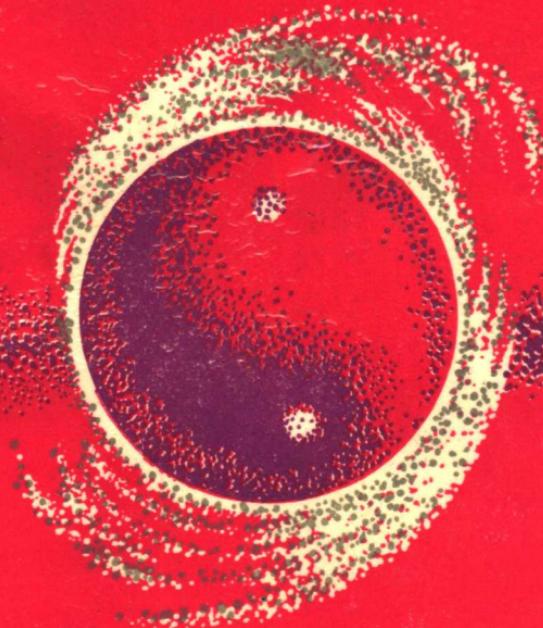


学易必读

中卷

易学指掌

房松令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学易必读

(中 卷)

易学指掌

房松令 著

(辽)新登字 16 号

学易必读(中卷)

易学指掌

Xueyi Bidu

房松令 著

* *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16024 大连市凌水河)

朝阳新华印刷厂 印刷

* *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83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 *

责任编辑:孙心伟

责任校对:寸一土

封面设计:李瑞明 孙宝福

* * *

ISBN 7-5611-0779-X

B·7

定价:(上、中、下卷) 24.00元

目录 Catalogue

学 易 必 读

Necessary Book of Studying

“The Book of changes”

易 学 指 掌

A Summary of Learning on “The Book of Changes”

第一章 圣易源流	1
第一节 占筮玄机论	1
第二节 圣人作易考	11
第三节 贤哲传易谱(上)	24
第四节 贤哲传易谱(下)	37
第二章 《易经》哲学	63
第一节 《易经》的哲学因子	63
第二节 《易经》哲学和儒家	73
第三节 《易经》哲学和道家与气功	88
第四节 《易经》哲学和中医	101
附 录 《易经》与中医学育学	115
第三章 《易经》象学	118
第一节 卦象和互体	118
第二节 爻象和卦变	129
第三节 卦气和爻辰	146

第四节	京房八宫	161
第四章	周易新学	168
第一节	《易经》科学学	168
第二节	《易经》外交学	181
第三节	《易经》艺术美学	200
第四节	《易经》决策学	214

第一章 圣易源流

第一节 占筮玄机论

《易经》是占卜用书。

占卜是一种预测或叫探测的巫术。古人无法明了千变万化的世界的因果关系而又渴望掌握这种关系以便预见和驾驭事物的变化，把握其结果。于是就发明了各种借助神秘力量来了解世界或事件真相的办法，这就是预测或探测的巫术，即占卜。

说占卜是巫术，自然也应该指出这种预测巫术与其它诸如防御巫术、希求巫术有所不同。预测巫术是为了掌握因果关系；而希求巫术或防御巫术则要达到某种现实结果，如制人于死，或使自己不受侵害。据此有些人类学者认为占卜与巫术有区别。但我们应该看到占卜与巫术都是建立在利用神秘力量这一基础上的，都有着清醒的实用目的，都是初民掌握世界的手段，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 Lucien)说：“从占卜到巫术的过渡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实现的”(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七章第3节)，因为它们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说占卜是巫术的一种——预测的巫术，或叫探测的巫术。

在古代社会中占卜是普遍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古代中国占卜的巫术也有多种。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已有龟卜、占筮、占梦、

占星、望气、日者，而日者中就有相面术。褚少孙补《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当时还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从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等多种占卜的家数。《武帝本纪》记有鸡卜。其它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如鼠卜（《汉书音义》）、瓦卜（《风俗通义》）、牛蹄卜（《晋书·扶余传》）、竹卜（《卜记》）、羊卜（《辽史·西夏传》、《梦溪笔谈》）、油花卜（《图经》）、米卜、田螺卜、篾竹卜、鸡卵卜（《番禹杂编》）等等，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些占卜形式庄严敬肃，神秘气氛较浓。有些占卜形式颇近于娱乐，如《西京杂记》记汉初宫中的棋卜，八月四日在竹下围棋，赢者全年有福；《唐诗摭言》记唐代的响卜，以除夕之夜听到的一句话来判断吉凶。

中国古代众多的占卜形式中最重要的是龟卜与占筮，合称占卜，占卜一词也就成了中国古代预测巫术的总称。古代中国设有太卜之官。《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兆之法（即掌龟卜），掌三易之法（即掌占筮），掌三梦之法（即掌占梦）。各种主要的占卜形式都有书。龟卜有《龟经》，现存的《龟经》是后人的作品。占筮有《易经》，《易经》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典籍。

包括占卜在内的巫术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极为重大的作用。巫术是人类在原始时代发明或领悟到的支配神秘力量的办法或曰法术，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幼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征服世界主宰世界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人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人类正是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之下才创立出种种英雄伟业来。在原始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巫术也具有振奋和团结的力量，它给人们期待和希望以战胜恐怖环境，因而它在激发颠蹶于艰苦中的人们的自信力和战斗力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所有的巫术都具有反科学的性质，非理

性的性质，荒诞滑稽的性质。但对原始初民来讲，巫术并不妨害他们的发展。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原始民族的民俗时指出，原始民族具有两个领域。一个是世俗的领域，如种植、造船、渔猎，人们都恰当地运用着他们掌握的知识。一个是神秘的领域，这一切都要用到巫术。二者的关系是分工明确而又并行不悖的（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与宗教》），因而初民的巫术并不能将人类引向反科学反理性的道路，而它给人们的慰藉和鼓励，却能使人类发扬奋斗的勇气而逐步真正地认识和掌握世界。这正如壮士上阵之前痛饮的美酒，不是要醉倒而是要更能凌厉一切，虽然纵酒误事的也大有人在。就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巫术，尤其是占卜的巫术也依然在流传。如日本，据资料统计，几乎百分之五十的人在升学就业等事前都要占卜，这也并没有妨害日本成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类的心灵总是需要安慰的，这正是占卜到现在依然流传或者说引人入胜的原因。这深刻地表现出人类心灵的特质。

占卜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在历史上的人类生活中起过这样重要的作用，而现在人们依然将它作为安慰心灵的手段，因而它也具有研究的价值，《易经》作为占卜用书也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我们研究《易经》却不仅仅因为它是占卜用书。它包括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堪称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因而研究《易经》固然具备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意义，而主要是具有哲学的意义。

《易经》是占卜用书，它却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是由它的特殊占卜方式决定的。

《易经》之占以筮草之茎揲数成卦的方法预测凶吉，因而又称爻占。古人认为寿长的东西都有灵性，龟为长寿之物，故以之

贞卜吉凶，而蓍（筮草）也是长寿的。大徐本《说文》曰：“蓍，蒿属，生十岁百茎”，小徐本则说“生千岁三百茎”，《论衡》说：“七十岁生一茎”，《书·大传》则说“百年一本生百茎”，总之寿命是极长的。因其寿命极长，便有了灵气，《龟策列传》：“父老云，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易纬乾凿度》则说得更神秘。用蓍茎布卦，就是运用蓍具有的神秘力量来预测，这是灵物崇拜的表现，《系辞》称此为“鬼谋”。但布卦还要经过“人谋”：人为揲策，其结果就有了规律性。揲策布卦的方式，依《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卦，四营成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即：占筮时取五十枚蓍茎（称为策），置其一而用四十九枚，象征天地未分的混沌之时，用两手任意将四十九枚蓍茎分而为二，象征由混沌状态分出天地，于其中取一枚放置在代表天地的两部分中间，象征人，然后再将两分的蓍茎四个一组的数，代表四季，将余下的蓍茎（四或不足四）卦起来（归奇于扐）表示闰月，因为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分别从代表天和地的筮茎中取其余数来归奇，计归奇两次。这就叫一变。一变之后，置其归奇者不用，余下的如法重来，是谓二变，二变之后，再如法一变，共三变，视所余的蓍茎为几组则得几，九为可变的老阳、七为不变的少阳，用“——”表示，八为不变的少阴、六为可变的老阴，用“—”表示，这就得出一爻之象。每卦六爻，故需十八变而成卦。古人认为这种占筮方式模仿了世界的形成过程，故《系辞》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占筮方式也指明世界的运动表现为一种数的运动，或者说是以数为依据的，因而占筮又称为数术。古人对这数有各种解释和推算，如“大衍之数五十”古人解释就各不相同，京房

曰：“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者，天地之生气。”《汉书·律历志》曰：“元始之象一，与春秋二、三统之三、四时之四相加，乘以五体。”马融曰：“太极北辰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不动，故不用。”当然，后人的这些解释和推算是否符合作易者的意图是大可怀疑的，但占筮的布卦方式是有意模仿世界的形成演化过程，以此来呼唤世界对自己的启示则是很明显的，因而这种神秘的演算其实已含有了某种哲学思考。

考察卦画，更有趣味。由“—”、“—”两种符号代表阴阳。由阴阳组成八卦，分别代表世间的八种事物。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卦，即表现了宏伟的宇宙之象，又表现了烂漫的人文之象。如屯䷂，描绘了云气漠漠春雷滚滚草木萌动的大自然春色，也涵蕴着创业伊始的屯难艰苦，预示着光明的未来；晋如䷢，红日初升，冉冉而上的自然景观，显示着人事的蒸蒸日上。每卦配上卦爻辞记述的各种故事，更将人事与自然联系起来。这样，这些卦画即指向终极的抽象：将世间万物抽象为阴阳两种素质；又指向了无穷繁富的个体：日出日落，车动鸟飞。它将宇宙和人生、自然和社会溶合为一体，显示出整个世界是个动态的体系，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这一切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启示性，包涵有丰富的哲学因素。世界上没有别的任何一种占卜形式能像《易经》占卜这样具有对世界的概括力、对人们的启发力。它作为先世圣王留给人们的预测世界变动展现人的祸福的神秘书籍，自然也就成了展示世界本源、表现宇宙运动的哲学书籍。《易经》和《易经》形成之前的占筮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源。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之源的《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易经》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它的布卦方式指明宇宙是以混沌未开的状态为起始的，卦画表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基本元素组成的，两种基本元素依据不同的关系互相作用形成了万物及其变化，而占筮就是掌握这种变化。这实际上指明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不是精神。不管人们对那种原始未分的混沌状态怎样理解（如《系辞》将其称为太极，《乾凿度》则进一步将其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而《孝经纬·钩命诀》则说：“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周敦颐《太极图说》又提出无极而太极）。也不管人们如何理解怎样由阴阳生出万物（如《系辞》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二而四、四而八的渐进形式。邵雍《皇极经世》的六十四卦次序之图则将它解释裂变。《乾凿度》“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用的也是《系辞》说的序列，但却不是简单的裂变。《系辞》又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又是一种万物生成的理论，即由阳而生，由阴而养，阴阳合德万物乃生。京房《易传》据此说：“乾坤二象合为一运，天入地交泰，万物生焉。”郑玄说：“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无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乎中，与天五并也。”这也就是说水生于天一，成于地六；火生于地二，成于天七；木生于天三，成于地八；金生于地四，成于天九；土生于天五，成于地十。这也是一种万物生成的方式）。人们尽可以从不同的着眼点去考察思索，有不同的说法，或者互相补充，或者互相矛盾，但总的一点是肯定的，都认为世界由混沌状态判出阴阳二气，由阴阳二气变化生成万物，

包括四时五行千品万汇，因而阴阳二气之说就被确立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本体论的最重要内容。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理论不承认它，不运用它。“易以道阴阳”这是《易经》哲学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重大的影响。

《易经》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因而它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无神论倾向。《易经》哲学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交通变化生成的，它就承认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的存在和变化的形式，否认了世界来源于一个人格化的神，或者说是一种绝对精神、绝对力量。如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之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王弼注《老子》本二十五章），根本不承认有造物主；孔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对神取怀疑态度。哲人们也都认为生死是自然之事，“天生天杀，道之理也”（《阴符经》），“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贾谊《服鸟赋》）都显示出一种无神论的取向。

《易经》哲学否定了世界上存在有一种绝对精神，因而它不引导人们去崇拜臣服那高高在上的神灵，却使人领悟到事物具有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断变化，这就是万物生死存亡的依据、吉凶祸福的根源。这关系和变化难以把握，这就使人们感到玄妙，所以《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在《易经》哲学的启示下，中国传统哲学重点讨论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人在宇宙的地位、取得自由的途径，不大注意讨论宇宙的本体，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哲人充满了把握世界积极进取的精神，尤其以道家为然。道家积极探求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的途径，追求人类永恒的进取目标，发出了或激昂或低徊的极为撩拨人心的呼唤。这是人类心灵最深处发出的呼

唤，因而它总在各时代人的心头引起共鸣的轰响。那些经世致用的人才的着眼点也是驾驭世间的各种关系以取得行动的自由。“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阴符》），处理好人和万物的关系天下就安定了。人能掌握住变化的机缘，达到神化的境界。“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见而成之”。（《越语下》范蠡语）人能够掌握世界。

《易经》对世界的领悟方式和它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润养之功也是巨大的。它将天地自然变化和人事的变动作为一体来表现，显示出天道和人道的一致性，使人们领悟到自然的法则也是人事的最高法则。“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管子·势》），“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存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人们在行动中也要“进退盈缩，与时变化”（《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政治上的最高境界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而人的行为的最高境界为“不言之教，无为之益”（《老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由易引发出的这些思想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各方面的生活，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许多特色。

《易经》的表达方式中最重要的是象。“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说法是符合《易经》情况的。卦爻辞揭示的意义远不足以指明象给予人们的全部启发，远不足以适应占筮预测需要的推类联想（会通）的要求。无穷的意义在象中，由象出发，鼓之舞之变而通之则能生发出不尽的意义来。这自然启发人们认识到明白而确定的语言固然是人们表达思想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这语

言的表现力确实是有限的，无法包容无限广大而精微的内容，只有理会了这语言所表达的象，由象去推类联想才能见到无穷之意。王弼于《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因而人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以及文化思潮都有重大影响。就文化艺术来讲，中国古人本来认为艺术起源于人们表现感情的需要。“诗言志”，所谓志，就是哀乐之心，所以《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屈原唱道：“介眇志之所惑兮，穷赋诗之所明”（《楚辞·悲回风》）。这意需借助于一定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形态就是声音、动作、彩色等所形成的象。声音、动作、彩色都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象，无穷之意就在这象中。中国古代的文学都是借助于象以表意的，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庄子便直截了当地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他便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表达思想，实际上就是用千姿百态的象来传达他那心中之意。中国古代的作品特别注重于象，显示出与《易》的表达方式的一脉相通之处，因此章学诚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深于取象者也……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文史通义·易教下》）而这一意、象、言的关系，一经王弼点拨之后，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在中国便出现了意象说，进而发展为意境说，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特色。

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易经》哲学的指导，并且产生了一些非常天才的思想。《乾凿度》说“阳倡而阴和，男行女随，

天道左旋，地道右迁”，《春秋元命苞》说“天左旋，地右动”。这证明至迟在西汉时代中国人就明确认识到天和地都是在旋转运动的。京房说：“月初光，见西方，已后生光见东方，皆日所照。”（《太平御览》卷四引《京房易说》）明确指出了月不发光。这些都是易家的发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受《易经》哲学指导的。中国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了浑天说。灵帝时蔡邕上书说“论天体者三家”，即：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而浑天说符合天的情状，史官侯台铜仪即是浑天之法。后来研究浑天说而较有成绩的汉末陆绩和东吴王蕃都是精通数术的。（具见《宋书·天文志》）。上述这些天文学的成就在世界的天文学史上都具有首创的意义。东汉道士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一书，总结了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炼丹术著作。它以《易经》的阴阳学说和汉易的卦气说来解释炼丹术。炼丹术是古代的一种化学，《周易参同契》显示了《易经》哲学对古代化学的指导。该书也讲炼己立基，养性立命，其实是内外并修，此书多用比喻，其语意可作多方面理解，后人又把此书理解为讲求炼内丹（炼精还气形成仙胎内丹）的书，对神仙家发生了很大影响。神仙家炼内丹实际上是用人的自我观照实现机体的自我调整，以保持生命活力和激发生命的潜能。炼精还气就是古人对生命奥秘的一种探求，而这种探求在古代中国是以《易经》哲学为指导并且收效颇著的。做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之一的中医，与《易经》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名医张介宾感叹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张介宾《类经附翼》）足见《易经》哲学对中医的指导作用。

《易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作用决定了《易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的影响决

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不研究《易经》就难以弄清中国历史文化，或者说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同时，由于《易经》是中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典籍，它自身就是重要的史料，是研究产生它的时代历史的可靠依据。因此《易经》是值得研究的，《易经》研究的内容也是非常广博的。

第二节 圣人作易考

研究《易经》，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占筮的起源。对这一问题，古代的传说有两种回答。一是伏羲，二是巫咸。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系辞下》）。

“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礼纬·含文嘉》）。

“巫咸作筮。”（《世本·作篇》）。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周礼·春官宗伯·筮人》）。

由于伏羲是传说中的圣王，《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所以伏羲压倒了巫咸，后世多认伏羲作卦而发明了占筮。就以这九筮之名的九巫为例，郑玄即改字解经，指巫为筮字之误。郑注贾疏指九筮为九件事，这九件事是需要先筮后卜的八种大事（八命）之外的事（参阅《太卜》、《占人》郑注贾疏）。巫更是筮迁都邑，巫环是筮可致师不也。这岂不与八命之一曰征、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

相重复？可见郑注贾疏实有不得已之故，故不避前后矛盾改字解经。宋代王与之《周礼订义》引薛氏黄氏之说，已驳郑注之非。其实这九筮之名九巫应该有别的原因，似乎是指九巫的九种占法，巫咸之筮为其中的一种。（《周礼》：占人以八卦占，筮人用三易，还要辨九筮之名，这说明当时占法有多种。又《左传》、《国语》记的一些占例，至今犹不能解，也透露了这一点。）伏羲虽然压倒了巫咸，但巫咸并未被人忘记，只是从“作筮”的首创者降为善筮者。皇甫谧《古史考》说：“殷巫咸善占筮”，梁元帝《洞林·序》曰：“巫咸之说，偏得研求”。《路史》也没忘记提上一笔：“神农时有巫咸之筮”。

现在我们讨论占筮发明权归伏羲或是归巫咸似乎没有意义，因为二者都是传说中的人物难以考稽。伏羲氏的遥远难凭以至司马迁作《史记》都不为他立传，而巫咸，历史传说上至神农下至殷商邈邈千数年都有他的影子，他除了作筮外还有不死之药，且能通达上帝（参阅《山海经》之《海外西经》、《海内西经》）。这些传说也说明至少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国大地上就有了八卦这种占筮方式。如果我们把伏羲作为中国大地人类文明初露曙光的时代的代称来看的话，说伏羲画八卦就正确了，因为巫咸缺乏这个资格。但是，如果向更深一步研究，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中国远古时代并非只有一个部族，占筮这种预测巫术不可能同时起源于各个部族，是哪一个部族（伏羲氏的部族，还是巫咸所在的部族）发明了这件事物对中华文明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影响呢？另外，正如卓越的人类学者宗教史家 W·施密特所说，巫术和宗教固然起源于集体的需要，然而其“最初的思想是在个人的脑海中已经构成的，而且必须由个人去解释”，其方法的选择也是按照个性，“尤其是按照法师的个性”来选择（参阅 W·施密特